

陈
峰
著

北宋武将群体 与相关问题研究

中
华
文
史
新
刊

中
华
书
局

ZHONG HUA WEN SHI XIN KAN



本书共分七章，以丰富的资料，揭示了北宋武将群体的形成，区分了武将世家、潜邸亲随、军班行伍、外戚成员等不同来源及其特征，并着意勾勒了北宋以文官抑制武将的轨迹。本书论证了具有几百万大军的北宋王朝，并非“轻武”，而是在防范武将这一前提下，用不懂战争、缺乏实战经验的文官，牵制武将对军队的有效指挥，从而对北宋的军事力量造成了极消极的影响。前人曾感叹“自来战伐，必乘衰微，宋当靖康，犹称极盛”，而面对金军，却一败涂地，以至灭亡。本书正是从一个新的角度，审视了北宋的兴亡。

中华文史新刊

北宋武将群体与相关问题研究

陈 峰 著

中 华 书 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宋武将群体与相关问题研究/陈峰著.

- 北京:中华书局,2004

(中华文史新刊)

ISBN 7-101-04221-X

I. 北… II. 陈… III. 军事人物-人物研究-中国-北宋

IV. K8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57801 号

书 名 北宋武将群体与相关问题研究

丛 书 名 中华文史新刊

著 者 陈 峰

责任编辑 崔文印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版 次 2004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04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12¹/₄ 字数 266 千字

国际书号 ISBN 7-101-04221-X/K · 1783

定 价 26.00 元

序

人们认为,中国古代正史的《兵志》体例始于宋祁、欧阳修等撰的《新唐书》。其实《兵志》亦非《新唐书》首创,比此书早三十年,宋朝记录太祖、太宗和真宗的纪传体《三朝国史》中已有《兵志》。元人编写《宋史·兵志》,大致是将宋代各朝正史的《兵志》拼凑而成,仍然留下了拼凑的痕迹。例如《宋史》卷187记载禁军屯驻分布,有“建隆以来之制”,无疑就是照抄《三朝国史》和宋仁宗、宋英宗的《两朝国史》,又如同书卷189《兵志》厢兵“飞将”后小注说:“自此至拣中骑射,凡三军,《三朝志》无。”《宋史·兵志》等作为古人介绍军制的作品,势必受当时军制学发展水平的局限。

二十世纪,史学家们开始重新研究中国古代军制,取得相当成绩。我个人受恩格斯为西方百科全书所撰释文的影响,决定另辟蹊径,按照现代军制学的规范,如指挥系统、编制、装备、通信、后勤、战略战术等,重新研究宋朝军制,于1983年出版了《宋朝兵制初探》。出版的当时,固然得到国内外的一些好评,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也确实在断代军制学的研究方面,实现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轨。但我至少尚有自知之明,认为自己的研究还不够深入细致,在内容和体系上肯定尚有不足,在史料上的错误亦不可免,故书名“初探”两字,不可不用。事实上,随着研究的深入,此书的学术价值确是在不断地降低,显得愈来愈陈旧,无再版的必要。但自己的精力却日益衰退,没有可能将原作重新

北宋武将群体与相关问题研究

改写。

幸好有陈峰先生等一些学者,有志于从事宋朝军制的深入研究,使我深感欣慰。陈峰先生此书作为他进行宋朝军制研究的一部分,功力甚勤,显然比我的旧作大为深入。此书系统地、深入地论述了北宋武将在枢密院地位的变化,各地统军体系中武将地位的降低,三衙将帅体制的方方面面,以及北宋后期的文臣和宦官统军等问题,其内容就比我的旧作丰富得多,不仅写了制度,更着重于制度的运作。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制度的运作也许是制度史研究更重要的一方面。至于论析北宋的武将群体,则为我旧作所未有。以往人们针对宋朝的文官政治,常用“重文轻武”一语加以概括,此语的缺点是可能产生误解,以为宋朝统治者不重视军事。陈峰先生经过认真斟酌,改用“崇文抑武”一语,并对北宋时的崇文抑武和驭将之策作了深刻的论析。总的说来,此书确是一部很有分量的北宋军制研究新作。衷心祝愿陈峰先生再接再厉,对宋朝军制的研究能连续不断地发表新作。

《中国军制史》的绪论曾对中国古代军制归纳为十二个方面,包括:(一)军事领导体制,(二)武装力量体制,(三)军队的组织编制,(四)武器装备制度,(五)兵役制度,(六)教育训练制度,(七)军队管理制度,(八)武官选任制度,(九)军事通讯联络制度,(十)后勤保障制度,(十一)军事法制,(十二)军制思想、观点、理论的发展演变。应当说,这十二条是相当全面的。以我的旧作相对照,确实存在一些缺陷。例如我的旧作对军制思想等就全无论述,后勤只谈了战时的运输,而未谈平时的粮秣、军器等贮备和保管,也未涉及军队的医药等问题。但旧作也有某些十二条以外的内容。

历史研究的基本特点之一,是在于实证性,在不少场合,确

是有一分史料说一分话。经济研究可以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索取资料,而任何时代,其传世史料再丰富,对后世的历史研究者而言,总是残缺不全的。例如清朝的史料,可谓浩如烟海,任何人也无法穷尽。但如人们开始重视《红楼梦》一书的研究后,虽然煞费苦心地搜索,而有关作者曹雪芹的生平记载却非常稀缺,无法为他作一完整的传记。再如二十多年前那次亘古未有的浩劫,虽然耳目相接,却已无基本的、必要的统计数字传世。我们这一代人,只要回想一下“文革”史,就会感到有不少重要的史实空白,只怕已难于弥补。

因此,面对上述的十二条规范,具体研究各代军制史,就只能遵循“量体裁衣”的原则,努力发掘史料,但有史料则写,无史料则不写。更不必完全拘泥于十二条。例如我撰写《金朝军制》,其中有“金军的多民族成份”一章。按十二条的规范,可以不写,但考虑金朝的史实,却不应不写。再如陈峰先生此书用相当大的篇幅论述北宋武将群体,按《军制史》武官选任制度,“主要包括各级武官的选拔、任用、考核、军爵、秩品、俸禄、致仕制度等”,而北宋武将群体的论述大体还是在上述规范之外。

总之,研究历史确实需要有先进理论的指导,但先进理论不应成为历史研究者的思想束缚,而应当促进人们的思想解放。

王曾瑜

2002年10月

前 言

在中国历史上,武将与文臣作为王朝政治的两大重要支柱,在历代统治过程中各负其责,共同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先秦时,孔子即云:“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①这一对文武的认识,可谓中国古代的基本政治常识。唐太宗更著有“阅武”与“崇文”两篇,进一步概括了文、武官的作用:“斯二者递为国用。至若长气亘地,成败定乎锋端,巨浪滔天,兴亡决乎一阵,当此之际,则贵干戈,而贱庠序。及乎海岳既晏,波尘已清,偃七德之余威,敷九功之大化,当此之际,则轻甲冑,而重诗书。是知文武二途,舍一不可。与时优劣,各有其宜。武士、儒人焉可废也。”^②这都充分地说明了“文武二途舍一不可”,武将在古代中国政治生活中具有同样的重要性。古代兵圣孙子则对“将”的作用有这样的评价:“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③“故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④

在中国古代文明社会的早期阶段,即所谓人类的“英雄”时代,一方面,因军事活动在社会和政治生活中占有至关重要的地

① 《史记》卷四七《孔子世家》。

② 《帝范》卷四。

③ 《孙子·谋攻篇》。

④ 《孙子·作战篇》。

位,乃有“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之说^①,即国家大事,以祭祀和兵戎活动为重;另一方面,因统治疆域狭小、内外矛盾相对简单,其政权结构及功能遂较为单一。于是,统治集团中并无严格的文、武区分,常常是贵族混兼文臣与武将职责。正因为如此,从“武”的角度来看,夏、商及西周所谓“三代”时期,天子左右的大臣,除了在内执政外,其在外的重要职责就是统军出征,即承担统帅之责,如姜尚、周公东征等典型例证。与此同时,各级武将通常皆由贵族组成,如《周礼·夏官》反映:西周时期,设置大司马一名,由卿大夫出任;小司马二名,由中大夫担任;军司马四名,由下大夫出任;舆司马八名,由上士担任;行司马十六名,由中士担任;旅三十二名,由下士承担。至于常备之师则以“国人”(平民)为主。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曾深刻地指出:“掠夺战争加强了最高军事首长以及下级军事首长的权力;习惯地由同一家庭选出他们的后继者的办法,特别是从父权制确立以来,就逐渐转变为世袭制,人们最初是容忍,后来是要求,最后便僭取这种世袭制了;世袭王权和世袭贵族的基础奠定下来了。”^②因此,在这一时期,从军不仅是一种义务,而且也是一种特权和荣誉。所以,当时贵族学校的教育内容——“六艺”,就有“射”、“御”等军事性的科目^③。孟子即云:“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④以后王安石便指出:古代士人习“文武之道”,以掌握射术和御乘为急,其他技能倒在其后,“于礼乐之事,未尝不寓以射”。故其

① 《左传》成公十三年。

②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162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③ 《周礼·地官·司徒第二》。

④ 《孟子·滕文公上》。

优秀分子人可为公卿大臣，“出则为六军之将”；其次者也能或任地方官吏，或为军队将校。所谓：“居则以是习礼乐，出则是从战伐”^①。南宋人也有感而发道：“三代而上，文武不分。春秋列国，军将皆命卿，处则执政，出则将兵，载于《诗》、《书》、《左传》，可考也。然此特谓将帅耳，乃若卒伍之贱，虽贤士亦为之，不以为异。”^②

至春秋战国之际，才出现文臣、武将队伍，所谓：“官分文武，惟王之二术也。”^③对此，现代学者杨宽先生已有精辟论述，概括而言即是：春秋、战国之际出现了集权的官僚政治，在国君之下，形成以相、将为文武首脑的官僚队伍。其特点是官分文武，这与西周春秋时代各国卿大夫同时掌握政权、兵权的制度不同，是适应政治上和军事上需要的结果。这样既有利于提高战争技艺，也便于把权力集中到国君手中^④。从此，武将作为群体与文官队伍开始政治分工，成为王朝统治的两大支柱之一。如秦汉时期，三公九卿中有太尉、卫尉、郎中令及太仆等武官，同时又存在诸将军、中尉、中郎、护军都尉、校尉等高级武将及更多的中下级武官，地方则有郡尉及县尉等武官^⑤。秦汉以降，各级武将的名称虽不断发生变化，但趋势却是设置更趋于健全和复杂。

自官僚队伍出现文武分工以后，一方面，武将拥有与文臣大致对等的地位，承担国防和军事活动的组织职责，其中高级将领更深受重用和礼遇。如《汉书》卷六八《霍光传》反映：当时大臣

① 王安石：《王文公文集》卷一《上皇帝万言书》。

② 洪迈：《容斋四笔》卷一六《昔贤为卒伍》。

③ 《尉繚子·原官篇第十》。

④ 杨宽：《战国史》（增订本）第221～222页。

⑤ 班固：《汉书》卷一九《百官公卿表上》。并参见安作璋、熊德基《秦汉官制史稿》第233页～251页。

北宋武将群体与相关问题研究

列名时,大将军及诸将军便在副宰相的御史大夫之前。后世还注意到:西汉时期,前后左右将军位上卿,金印紫绶,御史大夫也位上卿,却是银印青绶^①。由此可窥见当时将军显赫地位之一斑。宋代陈傅良云:汉朝“太尉相国列为三公,城门领兵得如五府”,“武帝留意边功,增设营校,卒置大司马官,尊宠将帅,以冠诸军,大臣之权尤偏重于将矣”^②。汉宣帝时,赵充国以后将军身份长期主持对羌战争,天子及公卿大臣皆对其言听计从^③。宋人孙何遂总结道:“谨按《史记》:汉高祖将定三秦,择良日斋戒,设坛场,拜韩信为大将军,部管诸将。魏故事:遣将出征,符节即授节钺,跪而推轂。北齐命将出征,则太卜诸庙,灼龟授旗鼓于庙,皇帝陈法驾,服衮冕,拜于太庙,遍告讫,降就中阶引上将操钺授柄。将军既执斧钺,对曰:‘国不可从外治,军不可从中制。臣即授令,有鼓旗斧钺之命,而无一言之命于臣?’帝曰:‘苟利社稷,将军以之。’将军就载斧钺而出,皇帝推轂度门曰:‘从此已外,将军制之也。’”^④宋朝孙何的这一叙述,正是羡慕以前朝廷尊崇将帅及其权威的事实。

另一方面,武将与文臣虽然存在分工,但双方之间也没有一道绝对意义的鸿沟,因统治需要,而常常有大将转任宰相,文臣出为将帅的现象,即政坛所谓“出将入相”之说。宋人曾经寻找

① 洪迈:《容斋三笔》卷一《汉将军在御史上》。

② 陈傅良:《历代兵制》卷二《东汉》。安作璋和熊铁基先生《秦汉官制史稿》第三章第一节《大将军(附各种武官)》,在对秦汉时期武将的设置情况进行叙述的同时,充分地肯定了高级武将在当时的重要地位,其中特别是大将军至前后左右将军的地位相当高,而大将军、骠骑将军的权威甚至在宰相之上,车骑将军、卫将军等也位比三公,在九卿之上。

③ 《汉书》卷六九《赵充国辛庆忌传》。

④ 杨士奇等:《历代名臣奏议》卷三二二《御边》孙何奏言。

了许多这方面的例证,来说明这种现象的存在:“汉初诸将所领官多为丞相,如韩信初拜大将军,后为左丞相击魏,又拜相国击齐。周勃以将军迁太尉,后以相国代樊噲击燕。樊噲以将军攻韩王信,迁为左丞相,以相国击燕。郿商为将军,以右丞相击陈豨”,其余如尹恢、陈涓皆以丞相出师^①。事实上,有关的实例还不止这些,如隋朝杨素、唐朝李靖、徐世勣、刘仁轨、娄师德及郭元振等人,也先后因军功而入朝为相(见相关正史中诸将本传)。据唐人记载:“高宗朝,姜恪以边将立功为左相,阎立本为右相。”于是世称:“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驰誉丹青。”唐玄宗时,郭元振、薛讷、李适之等“咸以立功边陲,入参钧轴”^②。另外,地方长吏转任或挂军职,指挥作战的现象也屡见不鲜,如西汉宣帝时,酒泉太守辛武贤出任破羌将军,随赵充国征讨西羌^③;东汉初,陇西太守马援在西陲指挥用兵,后封伏波将军,为一时名将^④;东晋陶侃在郡守、州刺史任内,多次领兵参加平叛行动,特别是在太宁三年(325),加征西大将军衔,镇压了苏峻、祖约之乱^⑤;唐、五代时期,从地方官成为军事将领,乃至藩镇割据者,更不在少数。

在此,值得特别强调的是,由于战国、秦汉长期实行军功爵制度,从而在社会上营造了强烈的崇尚军功的意识。通过从军立功而获得爵位,不仅可以得到相应的政治地位、特权和经济利益,而且能够受到社会的推崇,与此同时,还可以入仕为官。如

① 洪迈:《容斋续笔》卷一〇《汉初诸将官》。

② 刘肃:《大唐新语》卷一一。

③ 《汉书》卷六九《赵充国、辛庆忌传》。

④ 《后汉书》卷二四《马援传》。

⑤ 《晋书》卷六六《陶侃传》。

北宋武将群体与相关问题研究

秦有所谓“官爵之选与斩首之功相称”之说^①。即指秦之官职爵位的高低与军功的多寡存在直接联系。汉代虽然对低级封爵者授官加以限制,但官职对高爵者则仍然开放^②。这种军功爵制度一直延续到曹魏时期,其对社会价值观的影响,则更为深远。虽然魏晋南北朝因士家制度的存在,普通士卒的地位低下^③,但武将群体仍始终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当时门阀世族中统兵者便不少见,军功也成为世人向往的重要目标。尤其到南朝时,大批寒门出任将帅,不仅掌握军权,甚至控制朝政,乃至取得帝位。至于在北朝浓烈的武风之下,从武为将更拥有优越的社会地位,自不待言。现代学者研究指出:将军在汉代已经出现“用为优崇之衔”的情况,可以加给并不带兵的文官等。到魏晋南北朝时,诸“将军”逐渐演变成由众多军号构成的军阶,授予的对象“并不限于军官而已,也包括文职官员。”^④这种原本武事性的将军称号作为优崇之衔,可加授于武臣之外的文官的现象,也折射出军功在当时社会上依然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于是,在上述背景之下,相当漫长的历史中,统治集团中的精英人才常能被军旅所吸引。

战国以前,以贵族为主体的统治集团内,已涌现出如姜尚、孙武、管仲、孙叔敖、司马穰苴等一大批兼通治国之术的杰出军事家。战国之时,随着社会形态发生巨大变革,专业武将群体开始广泛吸纳统治阶级中的新兴力量,造就出一大批军功阶层。

① 《韩非子·定法篇》。

② 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已有相当多的成果。可参见本师漆侠《二十等爵与封建制度》,《求实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③ 参见何兹全《魏晋南北朝的兵制》,《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6本。

④ 参见阎步克《品位与职位》第34~35页,中华书局2002年版。

正因为如此,兵家在列国异常活跃,战将更在各国图强交战的过程中发挥出举足轻重的作用,如吴起、孙臏、白起、王翦、廉颇、乐毅等统帅,皆以其震撼天下的战绩与卓越的军事才能名垂史册。

自秦统一以降,就总体而言,各封建王朝在发展国家经济文化事业的同时,都以积极进取的精神,勇于扩张的理念,征服四方,拓展疆域,故大都注重武备建设。在此形势下,社会上尚武之风盛行,军营依然召唤着社会各阶层的杰出人才,因此武将队伍来源稳定。秦汉时代,军功阶层受到社会的崇拜自不用说,即使在魏晋时期,门阀世族并未放弃对军职的追求。如名士阮籍之谋求步兵校尉^①,谢石、谢玄之热衷带兵,桓温之长期把持大将官位等等。唐朝时期,战功仍然是提高政治地位的重要手段,如唐高宗时修《姓氏录》,“得五品官者皆升士流。于是兵卒以军功致五品者,尽入书限”^②。于是,千余年间,军事人才层出不穷,如秦汉时期的蒙恬、韩信、李广、卫青、霍去病、赵充国、冯异、马援等,三国魏晋南北朝的诸葛亮、司马懿、周瑜、桓温等,隋唐时代的韩擒虎、贺若弼、李靖、徐世勣、薛仁贵、郭子仪、李光弼、李晟等。即使文人学子也有“投笔从戎”的豪情壮志,如西汉的张骞、唐朝的边塞诗人便为典型例证。至于同期历史上无数军事将领创造的赫赫武功,都赢得了世人的崇敬。

正因为军功的强烈召唤,在九世纪以前的中国历史上,既出现了秦帝国大一统的空前辉煌,也形成了以“汉唐雄风”为标志的外向、扩张以及强悍的时代特征。在相当长的岁月中,英雄主义成为社会推崇的重要理念。这就难怪许多文人名士都对驰骋疆场的生活充满渴望,并要求子弟文武并重,将投身军旅视作人

① 《三国志》卷二一《魏书·阮籍传》。

② 《旧唐书》卷八二《李义府传》。

北宋武将群体与相关问题研究

仕的重要途径。如两汉之际,耿弇家本书香门第,“弇少好学,习父业”。但以后“常见郡尉试骑士,建旗鼓,肄驰射,由是好将帅之事”。耿弇在东汉的建立过程中屡立战功,为一代名将,在其影响下,耿氏一门子弟也多为将领,“三世为将”^①。南北朝时影响颇大的《颜氏家训》指出:“必有天才,拔群出类,为将则暗与孙武、吴起同术,执政则悬得管仲、子产之教。”^②又谆谆告诫道:“习五兵,便乘骑,正可称武夫尔。今世士大夫,但不读书,即称武夫儿,乃饭囊酒瓮也。”^③唐朝诗人李白不仅自己有“从军玉门道,逐虏金微山。笛奏梅花曲,刀开明月环。鼓声鸣海上,兵气拥云间。愿斩单于首,长驱静铁关”的志向^④,而且勉励外甥从军:“六博争雄好彩来,金盘一掷万人开。丈夫赌命报天子,当斩胡头衣锦还。”^⑤一时更有“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之类诗句唱响南北。中唐以后,文人还常常以投身藩镇幕府为进身要途,自愿效力于武夫悍将,所谓“大凡才能之士,名位未达,多在方镇”^⑥。五代时期,学子弃文从武的记载更不少见,如历仕五代后期节镇的焦继勋,原本书生,但以后却发誓道:“大丈夫当立功异域,取万户侯,岂能孜孜事笔砚哉?”^⑦

在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里,武将作为群体,其构成虽然前后

① 《后汉书》卷一九《耿弇传》。

② 颜之推:《颜氏家训》卷三《勉学第八》。

③ 《颜氏家训》卷五《诫兵第十四》。

④ 李白:《李太白文集》卷五《从军行》。

⑤ 《李太白文集》卷一四《送外甥郑灌从军三首》(之一)。

⑥ 《旧唐书》卷一三八《赵憬传》。并参见张国刚《唐代藩镇研究》第26页,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

⑦ 《宋史》卷二六一《焦继勋传》。

不一,颇为复杂,但却无疑吸纳了社会各阶层中的大批人才。曹操“惟才是举”的著名思想,就是这一史实的集中反映。更重要的是,统治者能放手武将指挥作战,如春秋时,司马穰苴斩杀贵臣监军庄贾,以树立主帅权威^①;战国时王翦用兵,秦王嬴政不仅授予其全权,而且满足其一切要求^②;刘邦拜韩信为将、周亚夫屯军细柳营的故事,更为典型;而如卫青、霍去病出塞北征,班超经营西域,李靖远击突厥等用兵过程,无不体现“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精神。如此便充分发挥并锻炼了将领的军事才能,故其群体素质相当高。还值得一提的是,不少武将属于文武全才,不仅精通兵略,而且谙熟经史诗文。如西晋征讨孙吴的大将杜预,便是当时著名的经学家。

值得注意的是,当中国古代出现上述强大的国防局面、武将群体获得充分施展能力的空间之时,其实正是民族尚武精神发挥的结果。诚如现代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在论述“英雄时代”时所指出:“事实上,一个英雄时代就是一个军事界线结晶化以后的社会和心理的自然结果。”^③

然而,到了宋朝,历史的格局却发生了转变,文武并重的传统演变为“崇文抑武”的风尚,所谓“声容盛而武备衰”。北宋王朝在边防上长期陷于被动挨打的局面,此前历史上中原王朝长期具有的外向、扩张以及强悍的国家特征消失,雄风不再。就武将群体而言,其与前代相比,无疑在各方面受到极大地钳制及防范,所扮演的角色、拥有的地位和发挥的作用日渐下降。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关注和深思,也不能不加以研究和探讨。我国台

① 《史记》卷六四《司马穰苴列传》。

② 《史记》卷七三《白起、王翦列传》。

③ 汤因比:《历史研究》下册第14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北宋武将群体与相关问题研究

湾学者黄宽重先生在《中国历史上武人地位的转变：以宋代为例》一文中已中肯地指出：“研究中国历史的中外学者，对武人的问题，如历代武将的角色、文武的关系、文武地位的变化及影响，甚至近千年来人们所强调、大家耳熟能详的‘儒将’、‘重文轻武’等观念的历史背景，都还有加强探讨与研究的必要。宋代是中国历史变迁的关键。它不但是中国转化为近代型的时期，而且由于它重文轻武，声容盛而武备衰，是文武地位转变的重要时代。以宋代为基点来探讨历史上的文武问题，不仅有助于了解中国历史发展的轨迹，更能掌握近代中国变化的趋势，和近代民族性格形成的因素。”^①

目前学术界对宋代武将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个案、有关战役、某些政策以及一般制度之上。如邓广铭先生对于岳飞以及北宋募兵制度的研究^②，漆侠先生对宋统治者防制武人以及宋辽战争的研究^③，王曾瑜先生对宋朝兵制及岳飞的研究^④，宁

① 载于黄宽重所著《南宋军政与文献探索》，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0年版。

② 邓广铭：《岳飞传》（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北宋募兵制度及其与当时积弱积贫和农业生产的关系》，《中国史研究》1980年4期。

③ 漆侠：《宋代对武人的防制》，《经世日报读书周刊》1947年12月31日；《宋太宗第一次伐辽，宋辽战争研究之一》，《河北大学学报》1991年3期；《辽国的战略进攻与澶渊之盟的建立》，《河北大学学报》1992年3期。

④ 王曾瑜：《宋朝兵制初探》，中华书局1983年版；《宋朝的文武区分和文臣统兵》，《中州学刊》1984年2期；《岳飞新传》，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岳家军的兵力和编制》，《文史》第11辑。

可先生对宋代重文轻武风气的探讨^①,何冠环先生对宋初三朝武将的量化分析^②,罗文先生对文臣统兵的研究^③,苗书梅女士对宋代武官选任制度的探讨^④,以及对诸如曹彬、王禀、岳家军群体人物的论述等等。而从宏观上对宋代武将群体地位加以论述者,还主要是黄宽重和刘子健两位先生^⑤,这些都无疑对宋代武将的有关问题进行了必要的揭示。

但是,遗憾的是,目前对宋代武将群体的构成和类别、武将在中央和地方军事体系中的地位 and 角色作用、武将的整体素质评价、统治者的武将政策以及社会风尚等等方面,还缺乏深入、全面的研究。几年来,本人曾就这些问题的某些方面进行了初步的探讨,并取得了部分研究成果^⑥。本书将以北宋为范围,在以往学术界和本人研究的基础上,对这一时期武将群体、武将政策及相关问题作全面的考察和探讨。在此需要说明的是,宋朝武官(或泛指武职)的涉及面很广,不仅中央三衙和军队中的各级将校(军职)、出征和镇守的统兵官属于武官,而且各种内职(诸使及三班使臣等)、库务甚至伎术官之类都纳入武官队列。这些担负内职、库务职责的武官,虽然往往可以出任统兵官,乃至升迁到枢密院,但终身不涉武事者也大有人在。本书

① 宁可:《宋代重文轻武风气的形成》,《学林漫录》第3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

② 何冠环:《宋初三朝武将的量化分析——北宋统治阶层的社会流动现象新探》,《食货月刊》复刊第16卷3、4期(1986年12月)。

③ 罗文:《北宋文臣统兵的真相》,漆侠主编《宋史研究论文集》,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④ 苗书梅:《宋代武官选任制度初探》,《史学月刊》1996年5期。

⑤ 黄宽重的论述已见前揭;刘子健所论为《略论宋代武官群在统治阶级中的地位》,《两宋史研究汇编》,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年版。

⑥ 见本书参考文献部分。